

洋务运动 对

近代工业影响探析

◎ 王健 著



国 家 出 版 社

洋务运动

对近代工业影响探析

◎ 王 健 著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洋务运动对近代工业影响探析 / 王健著. — 北京 :
团结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5126-5879-0

I. ①洋… II. ①王… III. ①洋务运动—影响—工业
经济—中国—近代 IV. ①K256.1②F429.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07635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河北优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 本: 170×240毫米

印 张: 13.75

字 数: 225千字

版 次: 2018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6-5879-0

定 价: 49.00元(平)

前言 Preface

19 世纪 60 年代出现的洋务运动延续了 30 多年。在这期间，中国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这次运动乃是清王朝封建政府在列强入侵并和他们相结合的产物。洋务派是以“自强”为口号，但是，洋务运动发展的过程，清政府却拍卖民族权益，换取国际侵略势力的支持，以巩固封建统治的过程；同时又是国际侵略势力驯化清封建统治集团，从而向中国政治、经济、军事领域渗透侵略势力的过程。从 19 世纪 60 年代第二次鸦片战争到 90 年代甲午战争，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这种勾结过程，正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形成和中国人民不断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在经济上，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迫使清统治集团寻找侵略势力的支持，他们首先从学习西方生产技术，创办近代军用工业开始。

近代军用工业的兴办，不可避免地要求兴建一系列与之相适应的近代民用企业。而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对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产生了破坏作用，为资本主义准备了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为民用企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提供了客观条件，某些官僚、地主、商人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开始投资于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

洋务派官员默察形势，便利用和控制了这种兴办近代企业的潮流，力图把它纳入为巩固封建统治的轨道。为此，他们提出一个“求富”的口号，并以“官督商办”的组织形式作为主要的形式来控制私人资本。这就使得“官督商办”的资本主义新式企业为中国社会关系的变化带来不少不同于一般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特点。本书准备就洋务运动的发展过程，剖析洋务派所经营的军用、民用企业的实质，探讨中国资本主义发生过程中的某些特点，深入研究洋务运动对近代工业的影响。

王 健
2018 年 4 月

第一章	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发展趋势	001
第一节	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发展	001
第二节	经济变革思潮	006
第三节	经济规律与变革思潮的汇流	010
第四节	社会经济“质的转变”	015
第二章	洋务运动的兴起	021
第一节	“两害取轻”的历史抉择	021
第二节	洋务运动形成的标志	025
第三节	对坚船利炮的购求	031
第四节	“借师助剿”对洋务运动的推动作用	034
第三章	从安庆内军械所到江南制造局	039
第一节	中国近代工业的开启——安庆内军械所	039
第二节	安庆内军械所到江南制造局的过渡	043
第三节	江南制造局的创办	046
第四节	江南制造局的属性	048
第五节	江南制造局的建制结构与产品	051
第四章	马尾船政局	057
第一节	建设轮船工厂的历史必然性	057
第二节	定位和创办历程	060
第三节	生产和发展状况	064
第四节	发展中的矛盾	068
第五章	机器制造局的发展	071
第一节	机器制造局的创办目的	071
第二节	机器制造局概况	072
第三节	近代军用工业的性质和作用	083

第六章	洋务派战略转变	087
第一节	列强从经济侵略到武装入侵	087
第二节	求强到求富的思想转变	089
第三节	由制内到御外的转变	093
第四节	洋务派的新发展	096
第七章	轮船招商局	099
第一节	创办目的	099
第二节	官督商办	102
第三节	经营过程	110
第八章	电线电报业的创办与发展	117
第一节	抵制列强侵权和经营电报	117
第二节	利商为本	129
第三节	电报局的作用	132
第九章	采矿业的兴办和发展	137
第一节	帝国主义列强掠夺中国矿藏的企图	137
第二节	矿业的开发	144
第三节	矿业的成败	156
第十章	铁路与纺织的筹建	163
第一节	对列强铁路修建权的抵制	163
第二节	自办铁路的尝试	167
第三节	纺织工业概况	172
第四节	洋务派内部论争	182
第十一章	洋务运动对近代工业的影响分析	187
第一节	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	187
第二节	洋务运动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189
第三节	洋务运动对军事工业的影响	200
第四节	洋务运动对民用工业的影响	205
	参考文献	213

第一章 中国近代社会历史 发展趋势

第一节 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发展

清朝末年，当统治者依旧做着“天朝上国”的迷梦时，英国首先发动了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豺狼般的西方列强们带着无尽的欲望和贪婪，在华夏大地上肆无忌惮地倾销商品、掠夺原料。而《南京条约》《望厦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迫使中国的自然经济一步步走向崩溃；通商口岸被迫打开、协定关税险遭破坏、外国商品大量流入，中国被迫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在民族危机的强烈刺激与爱国之心的驱使和清政府放宽民间设厂的限制条件下，早期的资产阶级开始积极引进外国先进生产技术和机器，投资近代企业。期间主要的企业有：上海发昌机器厂、广东南海的继昌隆缫丝厂、天津贻来牟机器磨坊，等等。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这一时期有了初步的发展，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资产阶级改革和革命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前提和内在动力，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奠定了基础。中国早期民族资产阶级存在以下特点：首先，技术力量薄弱，严重依赖外国资本主义技术，深受西方列强的控制；其次，封建统治阶级之所以放宽民间设厂限制，不是真正想改变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他们不过是为了扩大税源，解决财政危机，因此中国早期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得不到当时政府的真心支持，反受欺压；最

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资金少，规模小，技术力量薄弱。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致使民族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和妥协性的两面性，同时他们所遭受的剥削和压迫也是双面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与束缚。外国资本家利用从中国攫取的特权进行商品倾销、原料掠夺，控制着中国的海关和市场，中国民族资本在各方面发展都受其压迫。

一、民国初年民族工业“短暂的春天”和“黄金时期”

1912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封建统治帝制，民主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兴办实业的高潮来临，民族资本主义在此时蓬勃发展，迎来了“短暂的春天”。

1914—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民族资本主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

如前文所证，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与束缚，发展艰难。那么，又怎么会出现“短暂的春天”和“黄金时期”？“短暂”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首先，1912年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府——中华民国。从而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一些障碍，使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政治保障；其次，大革命后群众性爱国主义运动在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面对外国资本的加紧渗入，洋货越来越多地充斥中国市场，1904年首先由商务界发起抵制洋货的运动，1915年又因为反对“二十一条”再度兴起，在1919年达到高潮。抵制洋货，提倡国货，“实业救国”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奋斗目标，也成为各阶层爱国人士的共同理想。在此条件下，中国民族工业及时抓住机会，取得了较快的发展，甚至把市场拓展到国际之中，中国的一部分商品也进入了国际市场。这些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于是，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夹缝中的民族工商业，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春天”。

但是，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结构的分配不合理和地区分布的不均衡，客观上注定了中国民族工业不能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民族工业不完整

的发展道路，致使民族工业相对于外国资本主义力量薄弱，无法摆脱外国资本主义的控制；相对于封建经济两千多年的深厚根基，又不得不受其束缚。“实业救国”虽然没能拯救列强入侵下的中国，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工业的发展却为民主革命的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同时也促使了中国无产阶级队伍的不断发展和壮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条件。

国民政府统治下民族工业在曲折中发展：

第一阶段，1927—1936年国民政府统治前期，民族工业发展较快。国民政府统治前期，国内开设的厂矿企业数量增多、投资额扩大；兴办近代企业的地区也快速增多；在工业结构上，仍以轻工业为主，其中棉纺织业的发展最为迅速；但是受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压迫与束缚，民族工业的发展仍然十分艰难，有史料为证：

这一时期，丝织业由1928年的二万三千五百三十四部丝车减为1935年的七千六百八十六部。中国纱厂的厂数和纱锭虽有所增加，但开工率则下降，停工纱锭最高达一百五十九万多锭，占设备一半以上。1923—1936年十四年间，华商纱厂停工清理者有十三家，出售者有二十五家，破产归债权人接管者有十五家，出租改组者有三十三家。帝国主义的压迫是中国民族工业破产的根本原因，帝国主义在华资本又是中国民族工业的直接统治者和压迫者。

第二阶段，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受到严重打击。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民族工业发展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抗战爆发后，日军为了填补战争带来的消耗，对中国进行了野蛮的经济掠夺。多数民族资本家出于爱国情绪的安装，为了使企业免遭日本的掠夺，历尽艰险迁往内地，并尽一切努力恢复生产，对大后方经济发展和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阶段，1945—1949年国民党统治后期，民族资本主义萎缩。国民党统治后期，美帝国主义加剧了对华经济侵略，通过《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攫取了大量在华政治、经济等特权。随之而来，美国又加大对华商品输出量，排挤我国商品。民族工业进一步陷入绝境，纷纷倒闭。

国内，四大家族把持主要经济命脉，民族资本受到官僚资本挤兑，发展

艰难，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不断增加苛捐杂税，滥发纸币，导致通货膨胀。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一再受挫，畏缩不前。

二、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畸形发展的原因

（一）先天不足

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不同于欧美国家的发展历程，它不是对早期资本主义萌芽的继承，也没有经历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生产的发展道路，它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冲击和自然经济解体的前提下，直接在外国输入机器和技术的条件下产生的。正如有位学者所言“不是从农村内部生长出来的，并非农村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从外部移植或嫁接到农村机体上的”。

其先天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人才和技术储备不足。在世界历史的文明进程中，中国的各项技术发展一直世界闻名，手工业尤其发达，早在古代就有许多领先世界的科学技术，但却一直只有手工技术，缺乏机械化操作技术；人才方面，学识渊博、满腹经纶者不乏其人，但却缺乏动手能力强实际操作人才。而能经营大机器生产的科技和管理人才，更是凤毛麟角。资金不足，没有资本的原始积累，缺乏资金储备。掌握绝大部分资金的大地主和官僚们，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资金多用于购置田地，有的则存于外商银行。这一切造成了资金的不流通和严重匮乏。思想不充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化的进程先有启蒙思想广泛传播，又经历了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革命。

（二）“三座大山”的压迫

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受到“三座大山”的压迫，是其发展失调的根本原因。第一，外商资本的压迫和摧残。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第二，封建专制统治的阻挠。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封建统治势力为了扩大税源，增加财政，放宽了对民间设厂的限制，也正是由于其目的仅仅是为了扩大税源，增加财政，所以封建统治阶级并不能支持和保护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反而对其后来发展产生了阻碍。第三，官僚资本的压制。国民党统治后期，国民政府不断增加苛捐杂税，滥发纸币，民族资本受到官僚资本挤兑，发展

艰难。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形成，把持主要经济命脉，利用国家反动政权，积累了大量财富，压榨民族资本主义，最终导致了民族资本的萎缩。第四，缺乏政治保障和安定的环境。

（三）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对近代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从经济上看，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是一种新的经济因素，其产生和发展有利于社会进步；从政治上看，它导致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力量的发展，为维新变法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提供了社会基础，也壮大了无产阶级队伍，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阶级条件；从思想上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不断冲击和动摇着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为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传播提供了社会条件；从发展趋势看，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资金少、规模小、技术力量薄弱，没有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地区分布不尽合理，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难以独立发展。

总之，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是在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化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它的发展受到“三座大山”的压迫，因此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具有其革命性的一面，但是它的发展过程又因其资金和技术的不足，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不得不依赖于封建势力、外商资本和官僚资本。中国近代民族资本这种又反抗又依赖的矛盾状态，最终导致了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畸形发展。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在中国社会发生的洋务运动，是一场清政府为了拯救其垂危统治，以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创办和发展军用工业、民用工业企业，编练建设新式海军海防、陆军，并相应培养新型人才为中心，以达到富强目的的活动。不管清政府从事改革的洋务派自觉或不自觉、意识或不意识，他们的言行，在一定时期里是体现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要求的。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洋务运动是中国早期的近代化运动。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确，即：对洋务运动的研究，一方面要将它置于阶级关系中考察，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要将它置于经济关系、经济规律中进行考察；置于阶级关系和经济关系的相互关系中考察。其中道理也很简单，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经济肇其端，又归根结底取决于经济的变革；阶级关系来源于经济关系，反过来又对经济关系起着促进或阻碍的作用。

在过去一个长时间里，史学界习惯于以阶级和阶级斗争划线，将洋务派、洋务运动划在“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一边，加以全盘否定。这是由于仅仅把“两害取轻”的“起步”作为概括和评定整个洋务运动的缘故。这显然是片面地运用和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两害取轻”的“起步”，在政治上是反动的，但“起步以后对中国社会所起的作用，却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和反映这一趋势的进步思潮要求的。炸药通过导火线而爆炸，而不能把导火线当作炸药；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而起作用，不能把偶然性当作必然性。“两害取轻”不过是“导火线”“偶然性”而已。洋务运动既是顺应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必须从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历史趋势谈起。而这，又必须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经济规律开始起质的变化谈起。

第二节 经济变革思潮

时代进入清朝，中国的封建主义已发展到了它的末期。自乾嘉以来，资本主义因素已经萌芽。资本主义是商品生产高度发展的产物。在工业方面，商品生产的形式除较大规模的采矿，冶金等之外，主要有两种：一是专业的个体手工业主场，二是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副业。此两者，大多是生产同广大人民群众日常最接近、使用最普遍的产品，如丝、麻、棉纺织品和锅、碗、锄等生活、生产用品，故这种行业是最有生命力的，价值规律在这些商品交换中作用也最为明显；加之这些小商品生产者同市场的经济联系比较密切，同商业高利贷资本必然结下不解之缘，这就规定他们中的阶级分化比较迅速而明显。而小商品生产者的分化，必将成为最广泛地生长资本主义的起点。然而，在鸦片战争前封建自然经济结构还很牢固的条件下，这种分化不等于立即为资本主义造成发生发展的前提。因为当时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还很紧密，社会并没有产生足以战胜它们的具有很高劳动生产率的强大力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使商品生产者慢慢分化，但是否能为资本主义创造条件，主要还要看手工业作坊和工场的发展水平是否已达到可以进行产业革命的程度，而中国的手工作坊及工场的发展，距离这一水平线还是很遥远的。

由于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低下，大作坊所生产的商品远不能战胜个体小生产，这就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商品生产，还必须服从封建主义的经济规律，于是商业资本的积累向封建经济倒流，如吞购田地从事封建地租剥削、放高利贷等，所谓“以末固本”，反使商品经济的发展起着维护封建主义的作用。这就告诉我们，在鸦片战争前，商品价值规律即使对小生产者起到了一些分化作用，但也并没有为资本主义创造资本、劳动力和市场等条件。这从当时的商品交换情况也可得到说明。据统计，在清代中期以前，1 000 万两以上的年商品值，只有粮食、棉花、棉布、丝、丝织品、茶、盐七种，这七种商品，至少有 80% 是在农民之间进行交换的。例如，商品进入市场居第一位的粮食，约占七种商品值的 40%；居第二位的是棉布，约占 24%；第三位是盐，约占 15%。商品交换情况，基本上是粮食同盐、布间的交换，这也可以说是农民小生产之间的交换，即农民将粮食出售以换取日常所需的盐和棉布；而基本上不脱离农业的盐和棉布的生产者也以此换回口粮。粮食与盐、布两者的商品值恰好大致相当。这种情况表明，商品生产和交换，远未能突破封建主义的框子。要使正在萌芽的资本主义因素发展较快，必须使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剩余价值规律及其制约下的价值规律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的作用，从而使封建主义的一些剥削压榨——苛捐杂税、高利贷、地租等乃至水旱等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社会阶级分化的结果，服从资本主义的需要，纳入资本主义发展的轨道。然而，这种封建经济受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制约和支配的情况，是在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廉价商品输入才开始的。

鸦片战争前，以英国为主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输入中国市场量是很少的，据统计，当时清政府年进口总值不过 1 000 万两左右。以 4 亿人口的大国，区区 1 000 万两的进口商品，对国民经济不会发生多少影响。再说，这些进口商品除鸦片外，主要是毛织品、金属制品和棉花等物，与广大老百姓日常生活所需关系不大，这是造成商品值进口很小的原因之一。其次，由于税收高和其他附加于商品的费用较多，因而缺乏市场竞争力。当时粤海关税率平均达到商品值的 20 拓左右，其中最接近广大人民日常生活的二等白布高达 30 拓余，加上“陋规”的勒索、内地税和落后又昂贵的运输等其他费用，商品到达消费者手中，至少是商品值的 15% ~ 200% 以上。棉布等

低档的为一般百姓所需要的商品超过其价值的比率更高。而那时英国棉布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是比较低的，20世纪30年代只有40年代的30%，50年代的20%。如将所有以上这些因素加起来（即较高的产值和附加的高税率、高运输费和“陋规”等），可知棉布等与老百姓生活联系最密切的商品价格是很高的，因而这些商品在市场竞争能力必然很弱，无法同土布相较量。这使得外国资本主义商品远未能打开并占领中国市场，对封建经济结构不能发生什么破坏作用。相反，外国商品输入和中国土产品输出，都服从封建经济的需要，受封建主义及其国家所制约。

鸦片战争之后情况突变。首先，通过不平等的《江宁条约》及其附约的规定，税收大大降低了，关税只有商品值的5%，加之内地税“每两不过某分”的规定，最多只有商品值的10拓。两者相加，商品只要附加上最高不超过商品值的15%的税款，即可到达消费者手中。而在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规定“子口半税”商品只要附加于商品值的7.5%即可进口，比之战前减少了15%以上。第二，进口商品的价格在中国市场急剧下降，而且，其下降的幅度远超过上述比率数。这是因为，以英国为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段时间里，产品的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其中尤以棉纺织品的生产率提高更快：如1829—1831年平均为100，1844—1846年为323，1859—1861年为615，短短20年间增长3~6倍。劳动生产率提高如此之多和快，就意味商品值的下降，因而附加的所谓7.5%的绝对值也大幅度减少了，这也就决定产品价格下降更多。第三，资产阶级的倾销政策，也是价格下降的重要原因。资本家为了打开和占领市场，往往用暂时亏本销售产品的办法吸引顾客。据1852年米琪尔致港督文翰的报告说：英国“以低于成本20%~30%的价格，把布匹强销于中国”，有的甚至亏本35%~40%以上三个因素，使得鸦片战争后外国商品在中国市场的竞争能力大大加强了。

不仅如此，以英国为主的外商们接受战前的经验教训，认识到，要牢固地占领中国市场，必须制作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进行推销，才能在中国社会生根。于是，中国在鸦片战争后进口的商品，“大半皆呢羽棉布等物”。外国商品开始较广泛地同人民生活直接接触，同封建自然经济基础的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小商品生产者相较量。沿海地区土制纺织品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遇到价格低廉商品竞争的突然袭击，很快地衰萎了。向来靠

江浙棉布供应的福州、厦门地区的市场，也被“其质既美，其价复廉”的洋布洋棉所占领，造成“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的局面。上海又是开埠最早洋货直接销售的地区，这个地区的洋布价格，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如经济学家包世臣所记载的“价才当梭布三之一”，本来买土布者多改买洋布了。尽管在1847年后，由于中国人民的抵制和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顽强性，商品输入暂时有所减少，但总的趋势是廉价商品输入日益增多。这些廉价商品、特别是廉价的棉纺织品增多，摧残着中国的手工业。在19世纪40—50年代，正如马克思所说：“中国纺织匠因外国的这种竞争而大受其苦，这一点就在全中国引起了相当的震动。”

的确，这种“相当的震动”，在鸦片战争后不多年即在沿海开埠城市附近显示出来。有所谓“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的记载，广东顺德县竟至“女工儿停其半”。这是就某一地方说的，其他还有带全局性的记述，如“纺绩稀少，机轴之声几欲断矣”。这说明外国廉价商品很快扩展销售到了内地。这些都表示手工业产品抵敌不过洋货而濒于破产。据上所述，个体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受到摧残，主要是价值规律使然。地租、高利贷等封建盘剥，以及银贵钱贱、水旱灾荒所遭损失，则起了帮凶的作用。也就是说，随着资本主义列强侵入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及其制约下的价值规律在中国个体手工业者、农民小生产者的破产中日益起着主导的作用。

同一阶级分化，同一封建剥削压榨促使这种分化，甚至价值规律的作用也有某种程度的相同，但其社会效果却有质的不同：一个仍在封建主义范围内兜圈子，一个则突破封建圈子对社会转向资本主义方向起着推进作用。关于这个问题，常常为人们所忽视，没有认识到，前者是封建主义经济规律占着统治地位，社会经济生活受封建主义所制约；后者是资本主义经济规律逐渐起着主导作用，日益扩大范围的社会经济生活受资本主义所制约。认识这个问题很重要，它对于认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规律，尤其是经济规律和洋务运动的发生发展等，都有重要的意义。

还有一个与此有联系并有某种类似的问题须要说清楚，即太平天国革命促使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和小农经济大发展，是否为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创造条件的问题。关于前者已无疑义，对于后者，学术界则有不同的看法：一方

说，小农经济大发展，为发展资本主义创造了条件；另一方说，小农经济是封建自然经济的基础，只会对封建主义起维护作用。前者对还是后者对？这同“封建主义经济规律还是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起主导作用”密切相关。

太平天国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确实提高了产品的商品率，这不仅可以从国内市场贸易出现繁荣，有的地方“盛于未乱时倍蓰”看出，也可从国际贸易中，太平军占领丝茶产品区后，1863年丝茶出口量比之战前的1850年，茶增长一倍多，丝增长五倍以上得到证明。小生产者提供的商品量的增加，很容易导致资本主义的出现。此外，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由于地主逃亡或被消灭，封建关系松懈了，使小农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封建关系松懈条件下的小农经济与封建桎梏下的小农经济的社会作用是不同的。后者受封建主义经济规律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起着维护封建制度的作用，前者则如前文所说，中国社会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及其制约下的价值规律逐渐起着主导作用的条件下，小农经济必然是资本主义的温床。可见，那种说小农经济发展“只会对封建主义起维护作用”者，是由于未认识到封建经济规律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两种不同的主导作用会产生两种不同的后果；笔者以为，那种说太平天国革命造成小农经济发展，“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条件”的说法是正确的，但可惜未同资本主义经济规律逐渐起主导作用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分析。

由此可见，将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发生、发展提到实践日程上的条件，是外国资本主义侵入所造成的，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在这一前提下对此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它们汇成了中国社会资本主义历史趋势的巨流，以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洋务运动适逢其会。

第三节 经济规律与变革思潮的汇流

资本主义必然代替封建主义既是中国社会的客观经济规律，这个经济规律又已反映于思想家的头脑之中，形成了变革的思潮。这种客观同主观的一致性，必将导致资本主义近代化运动付诸于实践。这种实践的首先一个具体表现，就是学习西学。笔者把那时的学习西学称之为“经济规律与变革思潮

的汇流”，以显示学习西学的历史必然性。西学的范围很广，大致不外科学技术和政治学说两个方面。中国学习西学最早的内容当然是前者，因为这是当时现实的迫切需要，尽管后者也涉及一些。

上面讲到先进思想家们之所以认识到中国资本主义的必然趋势，并提出解除对它的束缚的意见，固然是由于他们从维护清朝封建统治出发，面向现实，寻找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的结果，但他们认识的发展，也是同对西方资本主义已有的认识密切相关的。认识西方，影响思想家们去洞察中国社会；洞察中国社会，又进一步促使他们学习西方。

中国人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认识是一个逐渐的过程。早在19世纪初，王大海在《海岛逸志》中就有对西洋诸国的论述，诸凡地理、人情、风俗习尚等固有记载，对于西洋的技艺也有叙述。例如，该书中谈到望远镜“用以御敌，可望敌营中，能周知其虚实，……诚鬼工之奇技”。书中还对轮船蒸汽机有所描绘，说锅炉中“贮以清水，火生气腾，冲动机盘铁叶，船即行驶如飞”。类似的记载在稍晚几年的《海录》中也有。《海录》是由多年在外国轮船上担任水手的广东嘉应人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的一部书。该书对西方亦有所了解。在19世纪初叶和20—30年代，人们对于西方了解的记录，主要出于好奇。虽然对认识中国的落后状态和提高自己的水平并无促进作用，但那时并不是出于政治经济改革的需要。鸦片战争中英国炮火的轰击，惊醒了一些有识之士，促使他们从政治经济改革的需要出发去了解西方，所以这种了解是有目的、有选择和比较有系统性的。这样的了解记录，首推1840年林则徐领导编译成的《四洲志》，其次是魏源于1842年初成的《海国图志》。这两部书都是为了了解西方的政治经济情况，以便采取对策而编写的，尤其是为了了解和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即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而编写的。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技”，《四洲志》有如下一些记载：英国“俗贪而悍，尚奢嗜酒，惟技艺灵巧。纺织器具俱用火轮、水轮，亦或用马，毋烦人力。”法国“俗尚奢华，虚文鲜实。精技艺，勤贸易，商船万四千五百三十”。《四洲志》编者对于西方技术的描述，显然是以赞赏羡慕的心情书写的，当然是反映了林则徐的思想。这种羡慕西方技艺的思想，鲜明地表现于对俄国彼得大帝学习西方的叙述上。《四洲志》中写道：俄国“及至比达王，聪明奇杰，离其国都微行，游于岩氏远览等处船厂、火器局，讲